

雲南省

雲南省地方志述評

雲南位於祖國的西南邊疆，在古代早已有先秦的部族；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曾設置郡縣；唐宋間有南詔、大理的割據；元建行省，後經明、清兩代，中原文化與邊疆文化進一步交流，地方經濟、政治和文化都有更大的發展。雲南纂修地方志為時較早，漢楊終的《哀牢傳》雖已早佚，但應視為南中地方志之權輿。一般講，雲南纂修地方志就是肇自晉唐，行於明代，盛於清人。以往人們所謂“滇學”，其實就是研究雲南地方志及地方文獻之學，雲南地方志書歷來為數不少，據不完全統計，現存通、府、州、廳、縣志共三百零一種；三千六百四十七卷。從版本而言，有稿本二十種，抄本百二十七種，刻本九十三種，石印本十五種，鉛印本三十五種，套印一種，影印一種，曬藍四種，這些地方志在省内主要庋藏於雲南省圖書館、雲南大學圖書館及雲南社會科學院圖書資料中心。雲南地方志不僅量大，而且前人已作過不少整理和研究工作，曾編制過書錄及索引，如梁之相的《雲南方志考》，李小緣的《雲南書目·方志之屬》、方國瑜的《雲南史料目錄概說》等，所收地方志比《中國古方志考》、《中國地方志綜錄》、《中國邊疆圖籍》的收錄，一般都詳細得多。

(一)

自古以來，雲南和四川大體是劃為一個大的行政區域來進行管理，由於內地人民與邊疆各族人民關係之緊密，內地人對雲南也有了較多的認識，因此晉人常璩在撰輯《華

陽國志》過程中，鑒於“蠢爾南域，在彼要荒。漢武德振，蠻貊是攘，開列州郡，幽裔來王。柔遠能邇，實於才良；甄德表先，以明紀綱。”於卷四立《南中志》、《志文》以總叙開始，對建安十九年（214）以前史事，大部分援引《史記》、《漢書》，也有引自《東觀漢紀》和《南裔志》的；對建安以後至永和三年（347）年以前這百三十多年間，由於南中地區經歷了蜀漢、晉及李成政權的統治，加之內部大姓勢力之強盛，爭相雄長一方，因而史事比較繁雜，故對這一時期的記述，除取材於《三國志》以下諸書外，還根據《南裔志》及自己的見聞，所以記載得比“正史”更為詳細。也就是說，作者是在總結前人對雲南認識的基礎上，並根據自己當時在雲南的見聞，加以綜合整理成書的。為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纂者認為它“文詞典雅，具有史裁”。這部書可以說是雲南早期的地方志。

唐朝咸通初年（862年左右）樊綽撰寫了《雲南志》十卷，也稱《蠻書》，是作者在咸通三年（862）充任當時安南經略使蔡襲幕僚時所作。在此之前唐朝曾派人到過雲南，回歸後曾筆之於書，如袁滋的《雲南記》，韋其休的《雲南行紀》。有的由於宦於西南，也把自己所了解到的南詔情況寫成著作，如韋皋的《開復西南夷事狀》，李德裕的《西南備邊錄》。樊綽就是在參考這些著作的基礎上，加上自己的見聞和調查，先向蔡襲提供，回去後進一步整理成書。此書通過：雲南界內途程第一，山川江源第二，六詔第三，名類第

四，六賧第五，雲南城鎮第六，雲南管內物產第七，蠻夷風俗第八，南蠻條教第九，南蠻疆界接連諸番夷國名第十，對雲南境內的交通旅途、山脉河流、重要城鎮、經濟物產、風俗習慣、六詔歷史、各族狀況、南詔制度、邊裔關係等作了詳細的記錄，可視為一部翔實的地方考察報告，據說當時是爲了給皇帝唐懿宗了解雲南情況看的，爲此材料儘量做到求實存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纂者稱譽爲“實輿地中最古之本”。樊綽的《雲南志》其價值在於資料真實、具體，就是由於它參閱並採摭了袁滋等人的著述，而袁滋等又是轉錄南詔人士自己所編的圖籍，南詔的圖籍雖未流傳下來，但後人却可從樊綽的《雲南志》中知其概略，使我們對南詔前期各方面的情況有所了解，這就是此書可貴之處。

到了宋元時代，地方志的纂修進入成熟階段，以前的地方志，一般都跳不出地理書的範疇，此時便有所擴大，歷史、人物傳記及藝文等，在志書中已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體例謹嚴，文字簡練，內容詳實。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雲南行省開始編造地理圖志之書，任中順“秉志勤苦，通曉文學”，且“久任雲南，習知風土”，乃主其事。所編圖志，以路、府、州分冊，各記其建置、沿革、坊郭、四至、八到、山川、土產、風俗、形勢、古迹、人物等類，“甚是可取”，據說當時爲“進三書”之一種。《雲南圖志》早無傳本，今僅存《大元大一統志》，有雲南麗江路佚文十一條，是研究雲南各地建置沿革、山川地理的珍貴資料。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河間人李京奉命宣慰烏蠻，由於“措辦軍儲事”，於烏蠻、六詔、金齒、百夷，二年之間奔走幾遍，對山川、地理、土產、風俗頗得其詳，始悟前人記載之失，蓋道聽途說，乃悉其見聞爲《志略》四卷，此書除了作者本人身歷目睹的一些情況外，還“參考衆說”，把元代以前的歷史，已纂修的地方

志，加上白文中的一些著述如《焚古通》等寫成，其中“諸夷風俗”部分，在某種意義上講，可視爲李氏的“旅滇筆記”，特別是記錄了當時雲南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及生活狀態，更是研究雲南古代民族史的重要資料。李京作書時曾獲見大理圖籍及元初政事的檔案文書，後來這些文獻已佚亡無存，故《混一方輿勝覽》關於雲南的建置沿革、景致、山川，可能是依據李京的《雲南志略》。李京原書雖已早佚，尚有片段留存於《說郛》及《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典》中，其所載“白人”、“羅羅”、“金齒百夷”、“末些”、“土僚”、“斡泥”、“蒲蠻”等，均係有學術價值的資料。

（二）

明清時期雲南地方志的編纂進入了全盛時期，對修志設有專門機構，省有通志館或志局，縣有志科。爲了配合纂修好全國性的《大清一統志》，要求各地先纂修好通志及府、州、廳、縣志，以便彙集資料。明代從洪武到天啓，雲南纂修通志八次。洪武三十一年（1398），西平侯沐春“歷覽舊志，事略辭繁，即命括蒼學者王景常，携李程本立稽諸邃古，芟採編撰，迨及有成，將獻納焉”。但“不幸捐館，二公說接踵應徵，弗終其差”。以後沐晟又命錢塘平顯“哀而次之”，乃於建文二年（1400）成書，次年刊本，是志因早佚而卷帙不詳，但其內容據王景常《序》稱：“西平侯命其纂輯是志，上分天文，下奠星土，貫穿禮樂、祀禋、疆場、食貨、藝文之事，雖不足徵前史之萬一，然一方大概亦可見其十之六七”。王、程志稿初名《〔洪武〕雲南圖經志書》，經平顯重編時改易今名，明人周弘祖的《古今書刻》有著錄。景泰四年（1454），朝廷下詔修纂輿地志書，派遣進士王谷來雲南，衆議由右布政使陳文總其事，“殫心竭慮，期搜訪之必料；尋故鉤新，

在去取之皆當。不四閱月而志書告成。”是書凡十卷，前六卷為《地理志》；後四卷為《藝文志》。地理分府、州立“建置沿革”及“事要”二項。事要又下分二十一門，所載文字簡略，大都錄自以前志書，並非當時採訪。藝文所載多元人所作詩文碑記。記述雖嫌簡略，但由於在纂修中，“遠稽諸經，近考史籍，條分縷析，明白詳盡。對雲南物產及少數民族情況作了簡要勾畫，頗具參考價值。由於《〔景泰〕雲南圖經志書》詳於詩文而略於事實，為補其不足，並續記後來事迹和人物，當時的雲南巡撫陳金，以為省志“闕制度，寓勸懲，不可不修”。於是倡議再修《雲南省志》，並委任彭綱主其事。綱乃定為擬式，指出合考書籍、公案，囑教授李介等督諸生、儒人依式編錄；復檄諸郡邑衛所，得其新舊事略，乃更稽討參訂，增削損益，使簡不遺，詳不冗，以適其中。書既成，題曰《雲南總志》，下分二十七門，其中學校、書院、驛館、哨戍等頗有價值，後人周季風纂修《〔正德〕雲南志》，即以是書為藍本。正德五年（1510），雲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周季鳳，在彭綱所纂修《雲南總志》的基礎上，“復加編次”，並“考於群史，參以前志，益以今日見聞，題以統記，題以分事，期月而始成”，纂成《〔正德〕雲南通志》四十四卷，並於次年刊本。是志以“纂志義例”二十三則開篇，卷一至卷三十三為正志，以布政使司、府、州等行政區劃為經，以建置、沿革、郡名、山川等二十四目為緯，又以事略、名宦等六目係後；卷三十四至四十四為外志，列寺觀仙釋、漢唐諸夷傳、大理國傳等目，又以元明碑碣詩文殿後。所分門類，多為新例，並補景泰後五十一年事，頗多可取史料。後來的志書多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萬曆初年，雲南巡撫鄒應龍提倡修志，大理人以李元陽“齒居鄉右，或識往事，因囑筆焉”。李氏因感前志尚多缺略，乃以《〔正德〕雲南通志》為藍本，纂成是志，成書後於萬曆四年

（1576），刊印於葉榆（今大理），全志分地理、建置、賦役、兵食等十二門，下係子目五十八，於地理、官師考述尤詳，所新闢兵食志，載明代衛所、軍實、屯征，是研究雲南經濟史，尤其是明代雲南經濟發展的珍貴史料。萬曆中，臨安衛人包見捷受當時雲南巡撫陳用賓之委托，纂修通志，於是包氏乃居家作《滇志草》二十二卷。因抨擊陳用賓的邊防政策，對陳於二十四年築干麓城於猛卯，大興屯田係安營置兵不錄，於是包見捷所纂《滇志草》多與陳用賓意見不合，被指為“書法不隱”，而未能受梓。後劉文徵纂修《〔天啓〕滇志志》，乃以此為底本。清人師範纂輯《滇繫》，收包見捷《滇志草》之《緬略》、《賦役志》、《兵食志》等內容。萬曆年間，福建長樂人謝肇淛任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自節駐葉榆，撫山川之美，感唐宋之事，乃搜羅通紀，咨詢耆舊，合所經見，刪繁剪陋，類列條分，衷以論斷，裁為十略，哀為十卷”成《滇略》一書。此書雖大體本圖經舊文，附益以新事，然作者本屬文士，記誦亦頗博洽，故是書引據有徵，敘述有法，詳近略遠，博觀而約取，較諸家地志體例尤為雅潔。薛承矩為此書作序，稱其上以搜楊終、常璩之所未及，下以補辛怡顯、李京、楊慎、田汝成諸記載之遺漏。杭世駿在《道古堂》集中收有是書之“跋”，亦謂其“蒼山洱水之墟稱善史焉”。這實非溢美之詞。此書版本據《邵亭知見書目》載有萬曆刻本，原為“鋤經堂”倪氏藏書，乾隆時編纂《四庫全書》，將此書收入，但三百多年以來一直未加刻印發行，故傳本甚稀。天啓間，昆明劉文徵取《〔萬曆〕雲南通志》及《〔萬曆〕滇志草》互為參校，“僞者正，舛者易”，又補後二十餘年間事，敘事止於天啓五年（1625），總釐十四志，九十四目，新增旅途、土司、官事，頗得其要，所錄資料較完備，體例亦精密，現存明代纂修雲南方志，此為最善。明末學者顧炎武撰《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顧

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於“雲南布政使司”，材料多取之於是志。此外包見捷所纂《滇志草》之面目，尚可於編中約略指辨。此志成書未刊，後為山東諸城鄧村尹氏“棣華書屋”舊藏，後北大圖書館於湖南湘潭陳氏處收得，另一鈐有“嘉定錢大昕”及“鎮洋縣署”藏章的抄本，現藏於中央民族學院。以上志書除洪武、弘治志及滇志草早已散佚外，其餘各部尚留存至今。至於府、州、縣志書，見於著錄者多達六十六種，而今存者則寥寥無幾，訪之亦未必再得。

(三)

清代雲南纂修的六部《雲南通志》，除了蔡毓榮纂修的《〔康熙〕雲南通志》，僅見諸著錄，未見傳本外，其餘五部較為完整地保存下來，敘事都比較詳細，份量也遠遠超過明代纂修的通志。蔡修《〔康熙〕雲南通志》成書由於抄本未刊，不僅卷帙不詳，亦未見傳世，修志事見於範修《〔康熙〕雲南通志》“凡例”稱“雲南通志修於癸亥年（康熙三十二年），彼時秩序恢復（按：指平定吳三桂之亂）未久，獻殘文缺，雖纂未全，但抄未刻。”范承勳所題《奏纂修雲南通志疏》亦稱：“雲南通志，先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經前督蔡毓榮纂成單本，具題送部在案。”又吳自肅《序》稱：“歲癸亥（1684），前督臣蔡毓榮仰承諭旨，輯書以獻。”可見蔡氏督滇曾修有省志，由於“時值元凶初殄，百務創興”，不僅“故老遺書，咨訪未遍，記載間或缺略”，也未能傳世而已。以後係承勳繼任雲貴總督，在蔡志的基礎上，“僅襲舊文，據摭近事，遵部限而上之。”這部《〔康熙〕雲南通志》共三十卷首一卷，內分三十門，與明修雲南志書相比較，大都錄自《〔天啓〕滇志》，材料未能重編，多仍其舊，因此王繼文在《序》中也說“未及精詳，尚多缺略”，看來僅係前志的續修，而且

用力甚少。雍正七年（1729）鄂爾泰總督雲貴，奉詔纂輯志書，乃屬姚州知州靖道謨因舊志增修，分三十志，志各一卷，每志之下，間附以目，類目與《〔康熙〕雲南通志》相似，首圖說，終雜記。乾隆元年（1736）書成，時值鄂去官，繼任督撫尹繼善、張允隨表進刊行。編端除進書表外，有凡例十五則及鄂爾泰等序，內容較舊志多有增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綱領燦然，視原本頗有條理”。在圖說上補充了舊志之所無，刪除了舊志冗復失實的材料，其中《水利志》經鄂爾泰着力搜集，記錄了當時治理水患，興修水利的情況，頗具資料價值。《〔道光〕雲南通志》的編纂，始修於道光六年（1826），雲貴總督阮元總裁，王崧總纂，後崧因與繼任者意見不合辭去，由李誠踵其事，十五年（1853）成書，由伊里布序而刊之，內釐十五志，下係子目六十八。是志比康熙志及雍正志有進一步的發展，因纂修者阮元、王崧、李誠均係當時知名的考據學者，編纂體例比較嚴密，所設門類雖多，仍較條貫，收錄事迹，多足徵信，特別對新材料十分重視，綜合了古今有關雲南的資料，具有一定的存史價值，如對明以前雲南的戶口進行了統計，並對有關材料作了系統整理，最後錄入志書；又如專立“南蠻志”，其中“種人”一目，就收錄道光以前纂修的府、州、廳、縣志中有關少數民族的資料，並在文字敘述前面插入了清代雲南著名畫家李仰亭繪的百一十九幅民族風情圖，堪稱圖文並茂；再如在《藝文志》中，增加了書目、金石等綱目，這對進一步尋求保存雲南史料和雲南文物，其貢獻是比較大的。而且類目各門互注，少有復出歧異之弊，較之前志更為豐富，其層序亦井然可觀，是纂修得較好的一部省志。《〔光緒〕雲南通志》則是當時雲貴總督蔡毓英為表彰自己的“功業”而纂修的，全書二百四十二卷，分十五日，細目略加增補為六十六，體例一本阮志，詳道光十五年（1835）後至

光緒初年事，後附《忠義錄》三十二卷；《忠義備考》一卷；《烈女錄》八卷。是志所記咸豐、同治間軍事，採訪多據傳聞，與事實頗有出入，當時人就認爲“難以僅今傳後，世咸病之”。所附之“忠義”，“烈女”更爲冗雜。至於《〔光緒〕續雲南通志》係當時雲南巡撫唐炯督辦礦務，有人告發其今污，炯以出資修志掩蓋其罪，自任總纂，聘一二文士刪削前志，新增“洋務”一門，成書二百卷，稿寄四川岳池縣覓工刻版，不斷年而新志出，唐炯報銷耗費數萬兩以了案，所以此志之潦草更甚於前志，之所以題名《〔光緒〕續雲南通志》，意在續《〔道光〕雲南通志》。除上述官修五部通志之外，尚有兩部私人所編省志。一部是乾隆年間謝聖綸所纂輯的《滇志略》。此書全名《滇黔志略》。據作者自序稱：待罪於黔之柱邑凡五載，待罪於滇之去邑及通判維西凡九載，因成此書，採於志者十之三，採於史子集者十之七，始於乾隆十三年（1748），迄於二十六年（1761），請養旋里後，詳加校正數，垂十餘載，考訂纂輯成書。滇黔合志，向無其書，聖綸獨纂輯爲之。內釐沿革、山、水、氣候、各宦、學校、風俗、人物、列女、物產、古籍、流寓、軼事、土司、種人、雜記十六卷，各卷目詳於卷首，編中每條下皆注所自出，間附按語，多所議論，亦斟酌不苟，儘管《〔道光〕雲南通志》說：“風俗鄭中，每就一二傳聞之事以概其餘，殊多失實，疏略亦屢見也”。這主要是因其所記多揭露當時社會矛盾，爲當權者及士大夫所不樂聞，實際上這些材料對於考究史事和當時社會矛盾，爲當權者及士大夫所不樂聞，實際上這些材料對於考究史事和當時社會情況頗有參考價值。另一部是浪穹（今洱源）王崧，所撰《〔道光〕雲南志鈔》。先是王崧應阮元聘參與纂修《〔道光〕雲南通志》，由於與繼任者伊里布意見不協，未竟業而辭去，並將所纂之地理、建置、鹽法、礦廠、封建、土司、邊裔數門成稿，交門人杜

允中校刻，收入《樂山集》，書口刻《〔道光〕雲南志鈔》，未釐卷數，傳本甚少。是志鈔雖貫串融會衆書，但不如《〔道光〕雲南通志》詳實，特別是王氏不熟史事，以經論史，往往有乖志例，而失之瑣碎。至於清代雲南所纂修的府、州、廳、縣志，除了富州、中甸、維西、思茅、他郎（即墨江）、安平、大關等廳沒有現存志書外，大多數地方至少有一部志書，多的達到五部，而且多係地方官聘請當地知名人士編修，所依據的資料爲檔案、家譜、史書、地方文獻、筆記、碑碣、實地採訪口碑資料等，一般可靠程度較高。由於以一方之人修一方之書，自然比較易於做到“地近則易校，時近則迹真。”

（四）

辛亥革命之後，世人認爲舊志所載“事迹多據傳聞，政典亦多缺略”。於是在龍雲，周鍾岳等的倡導下，於民國二十年（1931）開館重修《雲南通志》。通過組織人力，“集歷朝舊志，復者刪之，逸者訪之，闕者苴之，乖謬者訂正之”，並以光緒二十七年（1901）到宣統三年（1911）之事補之。歷時十二年，於民國三十二年（1943）脫稿，民國三十八年（1949）鉛印成書，題名《〔民國〕新纂雲南通志》，全書二百六十六卷，分裝百四十冊，約計六百四十八萬字，附表百九十八張，圖七十八幅。這部新纂雲南通志不僅卷帙較大，門類亦多，內釐紀、圖、表、考、傳五綱，考又列二十五目，傳列十七目，並以軼事、異聞、編纂校印始末殿後。由於是志集當時雲南學者名流專家分纂，修志人才薈萃，並各自施展其所長，便使志書較前志翔實，不僅文簡事核，而且體例條理井然，儘管未能很好達到“冀補前人之闕集各家之長”的目的，也有一些遺漏、缺略、訛誤及牴牾，但與往昔舊志比較，其優點仍然不少，如對農業、蠶桑、茶糖、礦產、鹽政等經濟

狀況有意濃墨重彩，對少數民族資料更着力收錄，這就充分展現了雲南的特點。所補入的圖三冊，繪制也比較精審，這些都是有參考價值的。堪稱是雲南已有通志中纂修得較好的一部。《〔民國〕新纂雲南通志》僅敘事到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後的資料，通志館原班人員纂修另一部志稿，上限起自民國元年（1912）下限斷至民國二十年（1931），間有延至民國三十五年（1946）者。由於時人修時志，論定為難，故仿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例，定名為《〔民國〕新纂雲南通志長編》。原稿為八十卷，二十門，體例則按實際發生事件設目，內釐大事紀、氣象、議會、內政、財政、教育、建置、交通、鹽務、司法、外交、社會、農政、水利、工業、商業、宗教、人物、金石、田糧、軍務等二十一類，最後經周鍾岳訂正，終未定稿付梓。《長編》志稿藏於雲南省圖書館。1984年，雲南省地方志辦公室組織人力整理校點出版時，有所增刪。本書資料豐富翔實，是研究雲南近現代史及編寫雲南省各專志、地志的重要資料。此外還有全省各縣地志資料百四十五種，邊疆民族地區地志資料四十三種。

（五）

雲南在明、清兩代及民國年間所纂修的三百多種府、州、廳、縣志中，頗多佳作，收入善本者四十七種。其中府志纂修得較好的有張毓碧、謝儼纂修的《〔康熙〕雲南府志》二十六卷。是志係康熙二十九年（1690）張氏“來刺雲郡”，“遂訪求遺老，哀集舊章”，本着“稽歷代之興廢，合本朝之善美”進行纂修，“凡山川、風土、前賢往迹，一一記載”，內釐十五志四十九目，而且注意到與通志體例儘量保持一致，所謂“一秉通志以為成憲，間有與通志稍異者，不過就其中之弘綱大目，為之條分縷析而已，非敢有

所異同也”。在纂修過程中也比較認真，“每脫稿，上之兩憲，嚴加核定，然後付梓”，因而當時人對是志的評價是“精詳明晰”。又如王尚用、張鎬纂修的《〔嘉靖〕尋甸府志》二卷，係“考之通志，參之往牒，而得其概，析類分注，分校互定”。內釐郡譜、星野、堤封、古迹、風俗、創設、食貨、官守、學校、武備、祀典、惠政、貢舉、人物、烈婦、外志、藝文、附錄等十八目，事迹記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具有明代地方志書簡括的特點。明朝隆慶年間，張澤、徐忾纂修的《楚雄府志》之卷，內分郡圖、沿革、天文、地理、食貨、官政、選舉、人物、裡祀、藝文、雜誌十志，下係子目二十一。體例簡明，文辭雅潔，在明修雲南志書中實屬上乘。是志於隆慶二年（1568）刊行，傳世極稀，僅日本靜嘉堂珍藏有歸安陸代“守先閣”所藏原刻本，雲南省圖書館據所攝照片百九十三張抄存。另外像康熙年間江南譙郡人蔣旭任蒙化府同知，纂修《蒙化府志》六卷首一卷，內釐地理、建設、賦役、秩官、人物、藝文六志，下係子目四十二，是志由於秉筆者親自動手採訪搜集故實，而且博學多識，鎔裁有法，又有熟知地方掌故的幕友陳金鉅等幫助潤色，致使此志條貫井然，資料翔實，特別是將蒙氏始末附於地理沿革之后，尤為得體，所記南詔發祥故實，與《南詔野史》及《南詔備考》諸書相較，別具特色，足資考證。無怪在其自序中稱：“巨細靡遺，綱目並舉，稿凡數易而始敢呈於各憲，胥印曰可，捐資付諸剞劂云。”實屬上乘之作。

在州志中，首先要算明朝正德年間王廷表與楊慎共同纂輯的《阿迷州志》，因兩人以家世交誼，共結蘭譜，所纂輯的志書，“考據之確，文辭之美，大有不同凡響者”，惜其書早已不存，惟從康熙間王民皞纂修的《阿迷州志》二卷中，可以概見《〔正德〕阿迷州志》之情形，二者當不致相差太遠。其次是《〔萬曆〕騰越州志》。騰越舊志，始創於明

正德間滕衝司指揮陳廉，陳氏視司篆時，曾延郡紳易翼之等兩修司志，題名《滕司志稿》。嘉靖時裁司置州，於隆慶間，知州沈祖學屬州人吳宗堯纂《州志》二卷，吳氏乃據易氏《司志》考校而成，於“田賦”最爲詳核，其中站赤屯賦尤有價值。因吳氏生長邊隘，諳習於山川、形勢、夷情，故是志敘述詳盡，議論皆切實，曾付梓人。萬曆四十二年（1614）李之仁知州事，招州人張邦教等纂爲三卷，僅從沈志續增五十餘年之事，其他無甚添益。又如雍正間祝宏、趙節纂修的《建水州志》十六卷，知府張無咎認爲“益前志所未備，其辭潔，其氣暢，繁而不失之冗，簡而不失之略”，較《〔康熙〕建水州志》有所提高。有的州志傳本已稀，如前幾年從宜良訪到的《〔道光〕姚州志》，過去僅有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殘本二冊，已彌足珍貴。這次所訪之本，乃爲全帙，爲清代雲南著名書畫家陳達的藏書。是志爲額魯禮修，王愷、王安廷同纂，五卷。從體例上看，是志鑒於以往所纂修舊志“雖分綱目，而片斷不清，事迹不備。乃經條析而篇分爲四，目分爲二十八”，並於篇首冠以輿圖，通過“舉其重者，也繪之圖，以便觀覽，而知全局”，從而使志書體例較舊志嚴密。從內容上看，對地“事關地方之民生之大者，乃着力記之”，例如對水利上當地所建之“泮”（即陂堰）的作用就作了詳細的記述；在物產中根據姚州地方的實際情況，對農副業及土特產經營記載尤詳，當中既有生產經驗之總結，又有重要的地方經濟史料。在材料的取捨上，強調嚴謹，認爲“志稱外史，例與史同”，即使秉筆者“雖乏班馬之才”，也“當仿董狐之筆”，由於“一字褒貶，千秋榮辱關焉”，因此切忌“徇情濫予或挾嫌指責”，力求做到“秉筆直書”和“寧嚴無濫”。對《人物志》要求堅持“必實有功德者乃彙入焉”；對《藝文志》主張所收詩文，要“關於此地之政教風俗，可以維持風化，感發人心者”，不單純着眼於文采的

華美，如不符合上述標準，“雖工何取”，因此對“一切賦景物，詠情懷，概不錄焉”。由於纂修志書的指導思想比較明確，故是志是纂修得比較好的。

縣志當中像昆明的第一部志書，戴炯孫的《〔道光〕昆明縣志》十卷，以私家之力在北京纂輯成。內釐疆域、山川、風土、物產……等十八志。編纂的原則是“詳採舊聞，擇從厥善，不敢侈於援引而失之濫，亦不敢貌似高道而近於略”，同時堅持“體例必審”，故甚爲謹嚴。加以作者在清代中葉“以詩古文詞雄視道咸之間”，係“五華五子”之一，因此“是書去取合宜，繁簡得中，有《朝邑》、《武功》之長而無其失，在近代中洵爲善本”。當時人看了這部縣志，認爲“守土者觀世知俗，得借鏡以爲行政之資，而有益於治”。是志的清稿本中，有“謏聞”一卷，爲刻本所無，係研究昆明方言的重要資料。康熙間彭兆達、楊搗秀纂修的《富民縣志》不分卷，內釐三十門。由於從“辨土宜而稽利弊”出發，於是把當地“留心典故者”找來參與其事，顧問咨詢，注意“相與博採廣收”，編寫時採取“疑者存之，信者增之，蕪者去之，誕幻者芟之”，這樣不僅在材料上使“向日茫茫無識者，皆有端倪可尋”，而且體例也堪稱嚴謹。另外乾隆間檀萃撰輯的《華竹新編》（即《〔乾隆〕元謀縣志》）十四卷，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成書付梓，《農部瑣錄》（即《〔乾隆〕祿勸縣志》）十八卷，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成書付梓。前者僅故宮博物院有藏本，後者僅前東方圖書館有藏本，不僅流傳極稀，從志書體例上看也是編得比較好的。特別是《華竹新編》第十四卷《人物志》附《吾氏本末》及《勸品土舍》，有可能像《農部瑣錄》中的《鳳氏本末》那樣，是比較完整的彝族土官世系編年。另外據《〔光緒〕安徽通志·文苑》記載，檀萃還在乾隆間纂修過《武定州志》。不僅未見傳本，也鮮爲人知，僅錄以存疑。康熙間魏

蓋臣、闕禎兆纂修的《通海縣志》八卷，內釐地圖、星野、沿革、縣制、學制、風俗、兵賦、天文、地理、建設、賦役、官師、典禮、人物、藝文等。通海在明代地當臨（安）、元（江）、開（化）要衝，雖有志乘，然蕩於兵燹，明志資料，多賴是志以存。李丕垣、李應綬纂修的《〔康熙〕河陽縣志》二十卷，成書未刊，內分圖考、星野、沿革、疆域、山川、風俗、城池、田賦、物產、秩官、學校、選舉、祠祀、古迹、名宦、人物、孝義、流寓、灾祥、藝文、雜異二十一目，下係子目五十七。是志詳記田賦資料，對清初河陽賦重的原因提供了較為詳實的資料。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是志與隴西分縣武陽志，打拉池縣丞志，同為國內現存的三部縣丞志，尤彌足珍貴。1961年上海古籍書店影印《續修蒙志縣志》十二卷，卷端《序》稱：“此係清稿本，未經刊行，鑒其內容豐富，包括不少我國邊疆史地資料，爰付影印。”經認真考訂，實係王錫昌纂輯，從卷末《編輯大意》得知，是志博採舊志及有關諸書外，並據採訪所得編寫成書，並於類目之下寫有“小序”，材料組織有法，層次條理清晰，文詞暢達，頗見纂輯者之功力。往昔，雲南藏書家“二十萬卷樓”主人梁之相，曾見劍川趙氏“詒安堂”藏有《劍川志稿》十卷，內釐地理、建置、天文、人物、秩官、選舉、藝文、雜著、雜誌，不著纂修人姓名，前後亦無序、跋，敘事至光緒末年，看來當係清末民初所纂。經梁氏考訂，認為係滇雲耆宿趙藩手筆，並引周鍾岳輓趙藩詩：“胸羅掌故數家珍，著錄於今已等身，獨惜未完鄉土志，後來編纂更何人”。以此證實為趙氏所纂之劍川志書。

雲南縣志中，尚有一些未刊稿本，為張翼夔纂的《新修中甸廳志書》，係因中甸前未修志，乃遍加採訪，創立志稿，申送省局，以備續修雲南通志，現僅存志稿，並有朱筆批點。段綬滋纂修的《中甸縣志稿》，分總綱、自然、政治、社會、雜俎之大綱，編纂多憑

實際調查，並參閱有關檔案編成，也是有價值的志稿。其他為李炳臣、李翰湘纂修的《維西縣志稿》、劉楚湘纂修的《騰冲縣志稿》、張笏纂修的《保山縣志稿》、丘廷和纂修的《緬寧縣志稿》、李群傑、彭嘉霖纂修的《昆陽縣志稿》、趙荃、唐世楷纂修的《馬關縣志稿》、李炳垣、馬挈纂修的《蒙自縣志稿》、牟崇鑫纂輯的《通海備徵志》，以及不著纂修人姓名的《賓川縣志稿》等稿本，均有待整理印行，以免散佚或湮沒。

雲南自古多鹽井，人民自採自用始於先秦，以後漸有商業性開採，既關係民生，又係封建政府課稅財源。雲南鹽井多在偏僻溝阱，方圓本不過數里，因其產鹽，漸成集鎮，經濟逐步活躍，工商業日趨興盛，於是朝廷委任提舉治理，鹽井志隨之而有，且代不乏修。康熙十二年（1674），陝西三原人來度任琅井（牟定寶泉一帶）提舉，在文士張倅協助下，纂修《琅鹽井志》六卷。康熙四十八年（1709），常州人沈鼎任提舉又纂修成《琅鹽井志》四卷。乾隆四年（1739），山西臨汾人李國義擬修未成。至十一年（1746），山東諸誠人孫元相任提舉，聘趙淳主筆，纂修成《琅鹽井志》四卷首一卷。康熙四十八年（1709），浙江會稽人沈懋價任黑鹽井提舉（龍川江沿岸之鹽興縣），命楊浚纂修成《黑鹽井志》八卷。乾隆五十二年（1787），署黑鹽井提舉朱璋仿康熙志纂修《黑鹽井志》八卷。嘉慶間，署黑鹽井提舉王定柱纂修《黑鹽井志》另定體例，分上、中、下三部，成書二十七卷。康熙間，白鹽井（大姚縣曇華山西麓）貢生陳廷佐，於教學之暇，纂輯《白鹽井志》八卷。雍正元年（1723）漢軍鑲黃旗監生劉邦瑞任白鹽井提舉，正擬修井志，忽有陳廷佐持所纂輯志稿進謁，請求井官批點。劉即以此志稿為基礎，訂為《白鹽井志》八卷。乾隆十九年（1754），山東汶上人郭存莊任白鹽井提舉，聘趙淳纂輯井志，並得胡蔚參訂，成《白鹽井志》四卷。光緒

二十四年（1898）江西臨川人李訓 澐任白鹽井提舉，聘多人分纂各志，彙成《續修白鹽井志初稿》，後經長白人文原考訂成書十一卷。以上諸志，因係鹽井之地方志除類目與縣志大同小異外，於鹽務記載尤詳。

至於雲南的山志，有高翕映、范承勳分別纂輯的《鷄足山志》，黃元治纂輯的《蕩山志略》，趙宗瀚纂輯的《石寶山小志》，趙元祚撰的《滇南山水綱目》，張鳳孫撰的《金沙江志》，黃土傑的《元河圖說》，孫髯的《盤龍江水利圖說等》，以及李坤纂輯的《雲南溫泉志》等，都是編纂得很有特色的。

從上述列舉的雲南地方志書來看，不僅纂修時代各不相同，編寫水平也不儘一致。但一般都力求歸體，多數志書爲了展現當地的歷史與現狀，成爲“一方之全史”，還注意把握這樣一些方面的記述：一是注意志地方之命脉，把雲南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置於重要地位，於地方之農林、水利、礦產、蠶桑、茶糖及特產着力記述，以見雲南經濟資源的豐富；二是關係民生休戚的災異如洪

汛、乾旱、地震、蟲害、瘟疫等，詳細記述其徵兆與災情，以便日後防患於未然；三是通過列“種人”類目，專記各族族屬、社會、衣著、髮型、習俗、風情及宗教信仰等，以見其所處社會階段，從而展現各族相互交往，共同開發邊疆；四是於各地四至道里，邊防要隘未予忽視，而且有的志書爲了切實紀要方輿，不僅採摭口碑，還登臨山水，邊亭親歷，從而爲後人究阨塞之險夷，咨民生之利病提供了可靠的資料；五是反映了邊疆與中原在經濟文化上的緊密聯係，水乳交融，從而展現滇雲文化之源遠流長；六是品驚人物，不僅堅持實有功德才寫入志書；而且本着“知人論事，求實存真，不欺不僞”，進行實事求是地記述；七是行文規範，均力求文筆典雅，用語質樸，言簡意賅。正因如此，這三百多種雲南地方書，不僅起到了存史、資治、教化的作用，而且對凝聚民族精神，發揚熱愛鄉邦情操將大有好處。這批“致用之書”，亦將嘉惠士林，典垂後世。（李孝友）

省 志

〔大德〕雲南志略四卷 (元)李京撰。京，字景山，河間人，大德五年(1301)奉命宣慰烏蠻。是志略係李京“始下車，會‘群蠻’不靖，巡行鎮撫，屢周雲南，始悟前人記載之失，悉其見聞為志略四卷，因報政上之”。成書後，曾於大德間(1297~1307)刊本，明陶宗儀編《說郛》節收不全，清人王崧雲南備徵志本傳抄清順治三年(1646)李際春所刊正續《說郛》本，但有篡改，與原刊本有所出入，另商務印書館曾據明抄本《說郛》排印，內容多“諸蠻風俗”七則，此書刊本早已不存，靠《說郛》本略窺概貌。其所記除作者本人身歷目睹的一些情況外，還“參考衆說”，把元代以前的雲南歷史，根據《華陽國志·南中志》、《蠻書》，加上白文的一些著作《玄峰年運志》、《焚古通》等寫成。後來這些文獻已佚亡無存，加之當時社會生活的記錄又是李京親歷目睹，故所載頗為重要，後來的《混一方輿勝覽》關於雲南的建置、沿革、景致、山川，可能是依據李京《雲南志略》。其中之“諸夷風俗”，可視為李氏的“旅滇遊記”，特別是記錄了當時雲南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及生活狀態，更是研究雲南古代少數民族史及地方史的重要資料。與此同時，元代在元貞年間，還纂修過《雲南圖志》，為當時“進三書”中之一種，只是此書早佚，難於稽考。(李孝友)

〔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十卷 (明)陳文纂修。文，字安簡，江西廬陵人，正統元年(1436)進士，授編修官，官至文淵閣大學士，遇事寬裕有容，人服其量，《明史》卷一三四有傳。是志係文景泰二年(1451)官雲南右布政使時，於五年朝廷詔纂修方輿志書，文受命總其事，遠稽諸經，近考史籍，博訪而統觀，窮搜而探遠，正舊志之乖訛，尋故鉤新，去取皆當，於邊疆里俗，食貨藝文之事，古今因革損益之宜，條分縷析，明白詳盡，不到四個月而成書，並於景泰六年刊本行世。是書凡十卷，前六卷為地理志，後四卷為藝文志。地理分府州，立建置沿革及事要二項。全書體例以各府、州及宣慰司、宣撫司、指揮使司、長官司為綱，下列載其建置、沿革、郡名、至到、風俗、形勢、公廡、學校、井泉、堂亭、樓臺、寺觀、祠廟、古迹、墓葬、橋梁、館驛、名宦、人物、科甲、題詠等二十餘門，惟各府、州、司不必盡備，

視各地之事迹而損益之。事要所載文字簡略，大都錄自以前志書，並非當時所採訪；藝文志所載，多元人作詩文碑記之文，亦錄自以前志書，却是現存明修雲南志中比較完備者，頗具重要參考價值，世人頗重其書，多見稱說。是志海虞陳揆之“稽端樓”，及北京圖書館均藏有原刊本，雲南省圖書館傳抄北京圖書館藏原刊本度藏。晉寧“學山樓”有精鈔本，後歸雲南大學圖書館。(李孝友)

〔正德〕雲南通志四十四卷 (明)周季鳳纂修。季鳳，字公儀，江西豫章人，寧州進士，湖廣左布政使。後官雲南提刑按察副使。是志係在彭綱纂修之弘治雲南總志稿的基礎上復加編次，並“考於群史，參以前志，益以今日見聞，綱以統紀，題以分事，期月而成，卷凡四十有四”。在正德五年(1510)成書之後，並未刊刻，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才刊印行世，此時距周季鳳編定已四十三年，但付刊時除職官題名外，其他未見增補，一仍原稿之舊。是志編端載周季鳳自序，晁必登序，纂志義例二十三則。卷一至卷三十三為正志，首列布政使司，次以各府、州、指揮使司、宣慰司、宣撫司、長官司為經，而以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勝、土產、戶口、田糧、屯田、職田、風俗、公署、學校、城池、驛堡、哨戍、宦績、進士等為緯，又以事略、名宦、流寓、鄉獻、列女、文章係後；卷三十四至四十四為外志，列寺觀、仙釋、漢唐諸夷傳、大理國傳、緬國傳等，再以元明碑碣詩文殿後。如與景泰雲南志相比較，地理各府分目大致相同，列傳之名宦、烈女，又外志之諸夷及文章，多出景泰雲南志而更詳實，事要係大事紀，為景泰雲南志所無。大抵區分門類多為新例，所載事迹補景泰以後五十餘年，保存史料，反映當時社會經濟、文化，頗多可取，別開志書新體例，後來志書多是在基礎上繼續發展。是志浙江寧波范氏天一閣藏有嘉靖三十二年(1553)原刊本，天一閣書目有著錄，北京圖書館所藏係影抄天一閣藏本，雲南省圖書館又抄北圖影抄本逐寫一部度藏。(李孝友)

〔萬曆〕雲南通志十七卷 (明)鄒應龍修，李元陽纂。應龍，號蘭谷，陝西長安人，進士，曾於萬曆間官雲南巡撫。元陽，號中溪，雲南太和(今大理)人，嘉靖丙戌(1526)進士，曾官荊州知府。剛直敢言，體恤民苦，生平博學多才，重實用，究理學，好釋典，著有《理性圖說》及《中溪漫稿》，為明代

白族學者及文學家。是志始編於隆慶六年(1572)，係鄒應龍提倡修志，鄉人以李元陽“齒居鄉右，或識往事，因屬筆焉”。元陽乃“遠取晉常璩《南中志》、唐樊綽《雲南志》以及韋臯、崔佐時、徐雲虔所爲南詔諸錄；近取臺院司道興革損益、兵餉經費、一切成規，釐爲十有二類，而以事自係之”。全書總釐十二志，即地理、建置、賦役、兵食、學校、科目、官師、人物、祠祀、寺觀、藝文、羈縻、雜誌，下又分五十八目。李元陽纂輯是志，係用正德雲南志重加編次，茲取兩本對校，地理、人物、藝文諸門，萬曆志錄舊志補六十一年事；地理復分建設、賦役、兵食、學校，各自爲類而加詳之，事迹大都出於檔案文書，頗得其要，較舊志更爲精密；羈縻考述尤詳；特別是新闢兵食，載明代衛所、軍食、屯征，是研究明代雲南經濟發展及軍事建制的珍貴史料。民國十二年(1923)重新排印時，龍雲序稱：“其諸民食兵役，山川阨塞，堡鋪險阻之要，亦頗詳核，過於李京《志略》甚遠。”但也還應指出：李元陽纂修《〔萬曆〕雲南通志》，抄錄舊志之文，經常竄改前人文字，如“百夷”改爲“焚夷”，令人疑惑；妄說白族與傣族同爲一族；更說南詔、大理政權係傣族爲主而建立的國家，致使歷史混亂，不識者不能辨別，有待訂正。此書《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紅雨樓書目》著錄爲十八卷，均誤。《〔天啓〕滇志》著錄爲十七卷，與原書合。自刊印於葉榆（大理）之後，傳世極稀，天津任振采“天春園”藏有原刊本一部，民國二十一年(1932)，雲南通志館曾與任氏協商，得曬藍本，復抄一部寄上海排印五百部，使僅存之本得以流傳。雲南省圖書館藏傳抄任氏度藏原刊本及排印本。原刊本首載李元陽自序及凡例七則；排印本增龍雲重印序。（李孝友）

〔萬曆〕滇略十卷（明）謝肇淛纂輯。肇淛，字在杭，福建長樂人，萬曆壬辰（1592）進士，曾官廣西右布政使、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是志成書之後，刻於撲榆（雲南大理），清初刻本已稀，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收入史部地理類。全書分十略：一曰版略，志疆域；二曰勝略，志山川；三曰產略，志物產；四曰俗略，志民風；五曰績略，志名宦；六曰獻略，志鄉賢；七曰事略，志故實；八曰文略，志藝文；九曰夷略，志苗種；十曰雜略，志瑣聞。雖大抵本圖經舊文，稍附益以新事，但由於纂輯者本屬文士，記誦亦頗博洽，故是書引據有徵，敘述有法，較

諸家地志體例特爲雅潔，材料亦稱翔實，尤以產略、俗略及夷略，最具學術資料價值。薛承矩爲是書作序，稱其上以搜楊終《哀牢傳》、常璩《華陽國志》，下以補辛怡顯《至道雲南錄》、李京《雲南志略》、楊慎《滇載記》、田汝成《炎徼紀聞》諸記載之漏遺。杭世駿《道古堂集》有是書之題跋，亦謂其“詳近略遠，博觀而約取，蒼山洱水之墟稱善史焉”。是志概括地方志書體例，分目錄其要，多出自《〔萬曆〕雲南通志》，增益新知，紀述頗具別裁，非徒綴拾資料可比，故論者多加推重。此書萬曆原刻本早佚，除《四庫全書》本外，有清抄本，係朱蔚圖吳拜經藏書，後歸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後又歸江蘇國學圖書館（即南京圖書館）雲南備徵志本係據江蘇國學圖書館清抄本錄出入藏。最近爲以廣流傳。雲南省圖書館據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行世。（李孝友）

〔天啓〕滇志三十三卷（明）劉文徵纂修。文徵，字懋學，雲南昆明人，萬曆癸未（1583）進士，遷四川右參政，官至太僕寺卿。其“幹略開敏，治身約素，掌統方任，垂稱著績”。成書於天啓間（1621～1627），具體年月待考。是志系以李元陽纂修之《〔萬曆〕雲南通志》，包見捷纂修的《〔萬曆〕雲南通志》草爲藍本，“僞者正，舛者易，非其本者鋤而去之”。加上自己的見解編成，內釐十四志，九十四目，一爲地理志，首爲地圖、沿革大事考；次爲郡邑地理，有沿革、郡縣名、疆域、形勢、山川、風俗、物產、堤、路梁、宮室、古迹、塚墓，各目下分府、州編錄。二爲旅途志，三爲建設志，四爲賦役志，五爲兵食志，六爲學校志，七爲官師志，八爲人物志，九爲祠祀志，十爲方外志，十一爲藝文志，十二爲羈縻志，十三爲雜誌，十四爲搜遺志。將是志與《〔萬曆〕雲南通志》相比較，《〔萬曆〕雲南通志》地理分府而略具其目；《〔天啓〕滇志》分目而係以府州。又萬曆志無旅途，羈縻志無土官官氏，這幾部分即錄自檔案。又沿革大事考，官師、人物、藝文諸門，補充了萬曆、天啓以後事，出自檔案及採訪。是志是明代最後纂修的一部雲南省志，其體例大都沿舊志，補萬曆初年以後五十間事，可說是比較完備的一部，前代事爲舊志所缺者，則分題搜遺以補綴，同時還新編了舊志所沒有的類目，如旅途、土司官氏等，頗得其要。以纂錄資料而言，《〔天啓〕滇志》可說是明代雲南志書中較爲充實者。從學術資料價值上講，由於前修諸本雲南志書流傳漸稀，《〔天啓〕滇志》成書

傳抄行世之後，明末清初研究雲南史事之學者，則多本《〔天啓〕滇志》，顧炎武之《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有關雲南史地郡縣，均依據《〔天啓〕滇志》、《〔康熙〕雲南通志》亦全錄此書，後修纂之幾部雲南省志仍多取法或沿襲是志。是志成書之後，有人認爲曾於天啓間刊本，依據是書最末題有“雲南布政司濟用庫副使李春榮梓刊志，匠頭陳信、王家相”字樣及繕寫人姓名，以此論定已鋟版，其實只是“謄清本”附上的待刊職事人員名單，故以後一直未見刊本傳世。現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澄中帶出的舊鈔本，係山東諸城鄧村尹氏“棣華書屋”舊藏。解放前中央研究院據此本曬藍一部，抗戰軍興，遷院入滇，此曬藍本與俱，雲南省圖書館遂抄度藏，並錄有副本，至是已湮沒三百餘年之滇雲文獻，又復重見南中，惟寫校不精，訛誤甚多，有待訂正。另外徐同帶出的另一舊鈔本，曾爲錢大昕、吳熙先後收藏過，並鈐有錢氏及滇洋縣署藏章。現藏於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李孝友）

〔康熙〕雲南通志三十卷首一卷（清）范承勳、王繼文同修，吳自肅、丁煒同纂。承勳，字蘇公，號眉山，遼東瀋陽（今遼寧）人，官至監察御史，康熙二十年（1681）任雲貴總督。在滇九年，所祛蠹弊其多，清鹽筴不得按戶抑派，酌道里遠近，定支撥軍餉條例，更不得巧法朘民，民甚賴之。王繼文，字在茲（湛瑤述聞作在燕），奉天（今遼寧）廣寧人，由官學生考授宏文院編修，順治十二年（1655）考選御史，巡按陝西，康熙間從平吳三桂，二十年官雲南巡撫。吳自肅，字在公，號克庵，海豐人，康熙三年進士，官雲南提學道，鼓舞造就甚得士心。丁煒，字瞻汝，福建晉江人，順治間授璋平教諭，後官雲南姚安知府，刻意於詩，力追唐宋諸家，王士禛極稱之，有《涉江問山詩文集》。是志係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前總督蔡毓榮已奉旨纂修成書，抄本未刊，范承勳鑒於蔡修志書僅襲舊文，係摭近事，遵部限而上之，未及精詳，尚多缺略，乃續爲纂修。可見范書之前已別有一本，而是書只是續修。是志卷首有康熙二十九年（1690）王繼文上續纂雲南通志疏，次載范承勳、王繼文、於三賢、許弘勳、張仲信、畢忠吉、吳自肅等人序，又有凡例二十四則，內釐三十門，下係子目十七。雖稱“序次有規，編輯有體，分條晰目，據事直書，既不敢失之略，亦不敢失之濫”，但與明修諸本雲南志書相比較，知大都錄自《〔天啓〕滇志》，滇

志補遺數卷，也沒有重編而按其舊。可見康熙間兩度纂修雲南通志，用力甚少，僅只保存舊文而已。所補清初數十年事迹，雖具條理，也十分疏略。是志成書之後，曾於康熙三十年刊本，但印本極稀。故宮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雲南人民出版社藏有原刊本。民國十九年（1930），昆明在舊文廟內設民衆教育館，修繕尊經閣，拆除樓梯板壁，發現《〔康熙〕雲南通志》版片，堆存在樓梯下，封存已久，無人知道，乃送交雲南省圖書館，重印數十部以廣流傳，現多爲後印本。（李孝友）

〔雍正〕雲南通志三十卷首一卷（清）鄂爾泰修，靖道謨纂。鄂爾泰，字顏庵，姓西林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雍正三年（1725）官雲貴總督。靖道謨，湖北黃岡人，官姚州知州。是志乃雍正七年（1729），鄂爾泰任雲貴總督時，命靖道謨纂修雲南貴州二省通志，乾隆元年（1736）完成雲南通志，乾隆六年完成貴州通志，二書同時鋟版。雲南通志成書時，鄂爾泰已內調，由繼任總督尹繼善、巡撫張允隨表進，故未言纂修始末，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雍正七年鄂爾泰總督雲貴，奉詔纂輯，乃‘囑姚州知州靖道謨因舊志增修，乾隆元年，後任總督尹繼善具表進之’”。是志係因舊志增輯，釐三十志，志各一卷，各卷之下，間附子目，首圖說，終雜記。與《〔康熙〕雲南通志》相校，十之八九相同，稍有增損，惟如《大事沿革考》應補《〔康熙〕雲南通志》以後之事，而是書不立此門，可能是因當時文網甚密，爲避免文字獄之故。其間視舊志增併不一，如圖之有說及府州縣題名，皆補舊志之所無，使命、師命諸目，舊志所有而冗復失當者，則刪去之；又課程原附鹽法，開壩堰塘原附城池，是書皆別自爲門，爲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綱領燦然，視原本頗有條理焉”。是志北京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及雲南省圖書館均藏有乾隆元年（1736）刊本。（李孝友）

〔道光〕雲南通志二百十六卷首三卷（清）阮元修，王崧、李誠纂。阮元，字伯元，號藝臺，江蘇儀征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道光六年（1826）官雲貴總督。王崧，字伯高，號樂山，雲南浪穹（今洱源）人。李誠，黃岩人，官雲南順寧（今鳳慶）知縣。後遷姚州州判。是志始纂於道光六年，由制軍阮元總裁，王崧總纂，後崧因意見不合辭去，由黃岩李誠任總纂踵其事，十

五年成書，未經進呈，適阮元內調京師，乃由繼任總督伊里布序而刊之。是書編端載伊里布序，次載凡例十八則，內釐總目十五，下係子目六十有八，份量較前修雲南志書大增，內容頗為豐富，此外尚有存疑、刊誤二卷。是志體例整齊，詳略適當，在今存明清兩代所修雲南通志十種之中算是纂修得較好的一部，因為前此纂修者，只是取舊志略加刪補，而是志用力最勤，非那些奉行故事，了草塞責之志書可比。其凡例云：“每類必詳悉顛末，正文專引成書，不敢參入私議，亦不敢漏載出處，攘美前人，間有所辨，則加謹案，雙行爽寫”。其門類多仍舊慣，而收錄事迹，稱引條舉，多足徵信，且各門互注少有復出歧異之弊，較之前志為豐實，其層序也井然可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纂修者阮元、王崧，都是知名的考據學家，特別注意歷史沿革的考證，對新材料亦十分重視，綜合古今有關雲南的資料。分門別類，旁徵博引，編纂體例也比較嚴密，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資料，如對明以前雲南的戶口進行了系統整理和記錄；又如專立南蠻志，其中種人一目，就收錄了道光朝以前纂修的府、州、廳、縣志中有關少數民族的資料，並在文字敘述前面，繪製了當時各民族生活風情圖，堪稱圖文并茂；再如藝文志中，增加了書目、金石等目，這對進一步尋求保存雲南史料和雲南文物，其貢獻是比較大的。是志有道光十六年（1836）刊本，光緒二十年（1894）重印，北京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天津任氏天春園、傅氏雙鑒樓、雲南省圖書館均有藏。（李孝友）

〔道光〕雲南志鈔（清）王崧撰，杜允中注。崧，字號籍貫見前。允中，浪穹人，王崧門下弟子。是書係阮元督滇，聘請浪穹王崧纂修雲南通志，因與繼任者意見不合，未竟業而辭去，改由黃岩李誠繼任總纂，盡棄成稿而重撰。當時王崧所纂輯之志稿已成地理、建置、鹽法、礦廠、封建、土司、邊裔數門，下係子目二十六，乃由門人杜允中注並刊刻，收入《樂山集》，書口刻“道光志鈔”四字，尚未刻卷次，疑刻工未竣版刻。此書體例，每事融彙衆書而述說之，未注出處，與《〔道光〕雲南通志》稱引條舉之體例全異。對於此書，劍川趙藩撰《續雲南備徵志·序》，曾引用趙聯元所說：“王樂山先生崧，應總督阮文達公聘請，總纂省志，視舊志為宏富，書成強半矣。文達述職入京，巡撫伊里布，不學人也，分纂黃岩李誠駁雜而怪僻，每與樂山齟齬，巡撫右之，於

是樂山託嫁女為辭不復來，李誠為總纂，於樂山原稿，多所篡改，草率成書，舛誤復沓。樂山聞而發憤，自刻所纂各門為道光志鈔以示別”。這是站在鄉人的立場所作不符事實的評價，也是對兩書未認真校讀，實際上王作不如李志，志書以保存史料為主，徵引詳注出處，這是李誠所纂《〔道光〕雲南通志》的長處。再從王、李兩人來看，李誠博洽有識，敘述有法；王崧雖通經學，却不熟史事，使志鈔義例而失之瑣碎。決不能因某些人為因素或感情色彩而揚王抑李。是志有道光九年（1829）刊本，收入《樂山集》，但此書傳世極稀，晉寧“學山樓”主人方耀仙經年訪求，得零本配成全帙，現歸雲南省圖書館藏，彌足珍貴。（李孝友）

〔光緒〕雲南通志二百四十二卷首一卷

（清）岑毓英修，陳燦、羅瑞圖等纂。毓英，字彥卿，號匡國，廣西西林人，光緒七年（1881）官雲貴總督。陳燦，字昆山，貴州貴陽人，光緒間歷任雲南澂江、楚雄、順寧等府知府。羅瑞圖，澂江人，曾任五華、育才書院山長。是志係岑毓英再次督滇，應宋廷梁、羅瑞圖、倪藩等建議設局纂修，經八年而書成。卷首載修志題名，有總裁，參閱、監修、督辦、協修、校對，而無總纂。編端載王文韶、譚均培、岑毓英、高釗中、吳奎、普津等六人序，凡例十八則，全書總釐十五目，與《〔道光〕雲南通志》同，體例一本阮志，細目略加增補為六十六。詳道光十五年（1835）年後至光緒初年事，道光十五年以前事迹，一仍阮志之歸，後附忠義錄三十二卷忠義備考一卷，烈女錄八卷，以上四十一卷均不入志書卷端著錄數。其書凡例說：“體例一仍阮志之歸，而近事按年以類詳為纂入”，可知纂修係以《〔道光〕雲南通志》為底本，而補《〔道光〕雲南通志》以後事。取兩本相校，《〔光緒〕雲南通志》增補有限，獨戎事增為九卷，詳於咸同間軍務，其目的係為岑氏表功；附錄的忠義、烈女，也係咸同軍事死者名錄，可見當時修志所留意者僅此而已。是編所載既為咸、同軍事，且採訪多據傳聞，與事實有所出入，難以信今傳後，世咸病之，故成書甫數載，復有唐志之纂輯。劍川趙藩撰《續雲南備徵志·序》，記是志纂修之經過：“自光緒九年疏陳設局從事，閱八寒暑，糜數萬金，局中官紳先後屢易，多不得人，大率風塵俗吏，兔園學究，襍綫猥材。局中以守道為總理，兩山長副之，候補知府為提調，而無總纂。總理不任筆削，擁虛名以束下；分纂各持

意見爲撰述，無所稟承折衷。總理既於分纂之優劣勤惰則不甚別白，分纂則益輕總理。於是志在薪水者相率故怠，緩延歲月，黠者甚至希旨迎合，徇私納賄，行恩怨於其間。戎事、職官、人物諸門，多是非失實，而採輯僞誤，文字之鄙冗亦不勝指”。從趙介庵所披露的“岑修”志書內幕，機構如此腐敗，自然不可能把通志修好。是志成書之後，於光緒二十年（1894）刊本。是志北京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雲南省圖書館均有藏本。道光十五年以前內容未另刊刻，與阮志共版刊印。（李孝友）

〔光緒〕續雲南通志稿百九十四卷首六卷（清）唐炯、王文韶等修，湯壽銘、陳燦等纂。炯，字鄂生，貴州鎮遠人，光緒間官雲南巡撫，後督辦礦務。王文韶，字夔石，浙江仁和人，光緒十五年（1899）官雲貴總督。湯壽銘，官雲南、安徽布政使。陳燦，字號籍貫官爵見前。是志修於光緒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成書。是志之纂修，表面上講是以光緒“岑修”雲南通志事迹多據傳聞，不足徵信，凡屬政典如洋務、鹽礦、裁兵諸大端，竟付闕略，未便咨送，故議改修。實則爲唐炯當時官雲南巡撫，後又督辦礦務，有人告發唐貪污巨款，爲掩其罪，乃重新開局修志，自任總纂，聘一二文士刪削前志，成書二百卷，稿寄四川岳池覓工刻版，不斷年而新志出，唐炯乃報銷耗費數萬兩以了案，故此書之潦草更甚於岑志。是編不載序跋、凡例、前列修纂職名及引用書目，內釐天文志、地理志、食貨志、學校志、祠祭志、武備志、洋務志、秩官志、選舉志、人物志、南蠻志、藝文志、雜誌十三門，新增洋務一門，下係子目八十七。此書體例分目，有的與《〔道光〕雲南通志》不同，引書目不詳注出處，書名錄於卷首，資料超不出前志，只是精簡字句而已。此書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鑄版印行，即由總督魏光燾進呈，題名續雲南通志稿，以示續阮修《〔道光〕雲南通志》，北京圖書館、南京圖書館、雲南省圖書館均有藏本。（李孝友）

〔光緒〕滇南志略六卷 又名滇南識略

（清）升泰修，劉慰三纂。泰，正黃旗蒙古人，官雲南布政使。慰三，爵里待考。此書體例仿黔南識略，於總序之後，分府、州、廳，從志書簡要錄之，而補道光以後事，並有空格待補，如各縣田畝、稅、糧之數，可能有待據檔案清冊錄入，說明全書尚未完稿。

是書編端載光緒七年（1881）升泰序說：“光緒己卯（1879），余拜藩鎮之命，七月至官，時制府劉公（即劉長佑）、中丞杜公（即杜瑞聯）樸刊雲南通志告成，得寓目焉。是書繁重至百八十卷，公暇苦不能遍讀，適檢篋中得愛必達公及李公廷輝所爲《黔南識略》，喜其簡而要舉，因以援劉慰三太守，仿其體爲是書，以便觀覽”。是書成書後，抄稿未刊，原稿爲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所藏，後歸上海圖書館，雲南省圖書館傳抄藏。（李孝友）

〔民國〕新纂雲南通志二百二十六卷 龍

雲、盧漢修，周鍾岳等纂。龍雲，字志舟，彝族，昭通燕山人，官雲南省主席。盧漢，原名邦漢，字永衡，昭通燕山人，官雲南省主席。鍾岳，字惺甫，號惺庵，劍川人，雲南通志館館長。是志係辛亥革命之後，世人認爲舊志所載，“事迹多據傳聞，政典亦多缺略”，於是在龍雲、周鍾岳等的倡導下，於民國二十年（1931）開館重修，組織人力、“集歷朝舊志，復者刪之，逸者訪之，缺者苴之，乖謬者訂正之”，並以光緒二十七年（1901）至宣統三年（1911）事補之，歷時十二年，於民國三十二年脫稿，民國三十八年鉛印成書，題名《新纂雲南通志》。是志卷首載龍雲、盧漢、周鍾岳、秦光玉等序，並載序例、題名，內釐綱五：曰大事紀，曰圖（其目九），曰表（其目六），曰考（其目二十五），曰傳（其目十七），而以軼事、異聞、編纂校印始末殿後，末載梁之相跋。這部新纂雲南通志，由於卷帙過大，門類浩繁，所收資料雖較舊志文簡事詳，體例也比較條理井然，但仍不免有所缺略和遺漏，敘事有的地方仍有訛誤，並前後矛盾，看來雖然未能達到“冀補前人之缺，集各家之長”的目的，但與舊志比較，其優點是：對經濟狀況如農業、蠶桑、鹽政及少數民族的資料注意收錄，補入圖三冊，繪製也比較精審，這些都是有參考價值的。正如龍雲在序言中所說“於天文、氣象、地理、交通、物產等均列考而備載之更詳，及社會、民生、實業等部門足資參稽”。此書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鉛印成書，全書二百六十六卷，分裝百四十冊，約計六百四十八萬字，附表百九十八張，圖七十八幅，共印八百部。除雲南省圖書館藏多部外，省內中小型圖書館均有收藏。（李孝友）

〔民國〕新纂雲南通志長編八十一卷 周鍾岳、趙式銘主纂。鍾岳字號籍貫見前。式銘，字星

山解，號弢父，劍川人，光緒甲午（1894）科副榜，後任通志館編纂。是書係《新纂雲南通志》原班人員纂修的另一部志稿。《新纂雲南通志》僅敘事到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以後的有關資料，通志館在當時別為纂輯，上限起自民國元年（1912），下限斷在民國二十年，間有延至民國三十五年者。由於時人纂修時志，論定為難，故仿李燾例名為長編。原稿八十卷二十門，體例按實際發生事件設目，內分大事紀、氣象、議會、內政、財政、教育、建置、交通、鹽務、司法、外交、社會、農政、水利、工業、商業、宗教、人物、金石、田糧、軍務等，曾經周鍾岳審閱訂正，但未付梓行世，稿存雲南省圖書館。1984年，雲南省地方志辦公室組織人力整理成上、中、下三冊，並按原稿資料加人物一卷排印出版，卷端載寧超序。本書資料豐富翔實，是研究雲南近代史及編寫雲南省各專志的重要資料。（李孝友）

〔道光〕雲南備徵志二十一卷（清）王崧輯。王崧字號籍貫見前。是書係道光年間，王崧總通志局事時所編，在纂修志書之暇，搜輯前人記載滇事之書六十一種，內釐：卷一《史記·西南夷列傳》、《漢書·地理志》上、《漢書·西南夷列傳》、《續漢書·郡國志五》、《後漢書·西南夷列傳》、《華陽國志·南中志》、《山海經·海內東經》、《水經注》、《晉水康三年地紀》、《晉書·地理志》、《隋書·地理志》。卷二《蠻書》。卷三《新唐書·地理志》、《唐書·南蠻列傳》上、中、下、《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卷四《資治通鑒》。卷五《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四夷徼外南蠻》、《桂海虞衡志志略》、《文獻通考·四裔南詔略》、《西原蠻略》、《記古滇說》、《宋史·外國大理列傳》、《蠻夷列傳》、《雲南志略》。卷六《元史·本紀》、《地理志》。卷七《滇載記》、《鴻猷錄》、《圖書編之谷山筆塵》、《曲洧紀聞》、《緬略》、《滇史略》。卷八《南詔野史》。卷九《明史·本紀》、《地理志》、《諸王傳》、《沐英傳》、《四川土司傳》、《雲南土司傳》。卷十《明史·雲南土司傳》。卷十一《滇考上》。卷十二《滇考下》，卷十三《春明余略錄》、《明史稿》、《求野錄》、《也是錄》、《附滇係所採雜說》。卷十四《續宏簡錄》、《滇黔遊記》。卷十五《雲南蠻司志》。卷十六《度聞錄》，卷十七《雲南事略》，卷十八《維西見聞錄》。卷十九《騰越州志·忠烈傳》、《雲龍紀往》。卷二十《續資治通鑒》、《平定三逆述略》。卷二十一《滇係事略》、《明黔寧王浙世襲事

略》。是書將有關雲南史事文獻彙為一編，題名《雲南備徵志》，此書係自漢至明雲南歷史資料彙編，以事為主，照錄全文，要籍粗備，堪稱“滇南大典”。阮元及伊里布見而悅之，以局中經費付梓，前有宛平查材弁序，印數無幾，咸同兵燹版毀，更係鳳毛麟角，呈貢秦光玉搜訪多年，始覓搜全帙，原本又為當時雲南高等學堂教習日本人江部淳夫借去不還，秦氏只好將所還之抄錄副本，重新訂正所輯原書，宣統間，代理學政郭燦主持用鉛字排版印行，前載提學使葉爾愷序昆明陳榮昌序，後編輯雲南叢書，輯刻叢書處將其收入。雲南省圖書館藏有道光刻本，缺卷七、卷九、卷十一、卷十三至十四、卷十六共六卷，雖係殘本亦彌足珍貴。宣統二年（1910）雲南官書局鉛字排印本，在省内各類型圖書館，度藏者頗多。（李孝友）

〔民國〕續雲南備徵志三十二卷 秦光玉輯。光玉，字璞安，雲南呈貢人，曾任雲南省圖書館館長。是編係繼王崧所輯《雲南備徵志》之後，將其未收之善本及近代記載滇事之重要資料，編輯成書，始於民國二年（1913），成書於民國十三年，所取材料計六十六種，而搜羅之書則達百種以上。內釐：卷一《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下十三州志》、《括地志》、《元和郡縣志》、《舊唐書·地理志四》、《舊唐書·西南蠻列傳》、《舊五代史·外國列傳二》、《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雲南機務抄黃》、《百夷傳》、《雲南山川志》、《炎徼紀聞》卷四。卷二《滇略上》。卷三《滇略中》、卷四《滇略下》。卷五《行朝錄》《西南紀事》。卷六《南疆逸史》、卷七明《季南略史外》、《南中雜說》。卷八《吳三桂始末》、《續通考輿地考·梁州南境》、《清通考·輿地考雲南省》、《滇南新語》。卷九《水道提綱》、《徵緬紀略》、《從徵緬甸日記》。卷十《滇海·虞衡志》下。卷十一《滇海虞衡志》下、《於役迤南記》。卷十二《擊經堂集》、《滇游續筆》、《嘉慶一統志·雲南統部》。卷十三《補三國疆域志》卷下、《東晉疆域志》卷三、《十六國疆域志》卷六、《補梁疆域志》卷四、《滇南礦廠工器圖略》上。卷十四《滇南礦廠工器圖略》下。卷十五〔道光〕雲南志鈔·封建志、《滇南山川辨誤》。卷十六《聖武記》。卷十七《林文忠公政書》、《迤西回漢事略》。卷十八《庸庵筆記》、《滇亂紀略》、《咸同野獲編》、《滇中瑣記》、《周氏宗祠記》、《騰越杜亂紀實》。卷十九《滇事述聞》、《湘軍記平滇篇》、

《騰、永、順、雲兵變篇》。卷二十《光緒條約·英國之部》。卷二十一《光緒條約法·國之部》上。卷二十二《光緒條約·法國之部》下。卷二十三《滇緬劃界圖說》。卷二十四《雲南勘界籌邊記》、《西徼水道》、《富良江源流考》。卷二十五《宦滇存稿》。卷二十六《新元史·本紀》、《新元史·地理志》四、《新元史·賽典赤瞻思丁傳（子納速刺丁忽辛附）》、《新元史·張立道傳》、《新元史·蠻夷列傳》。卷二十七《案事編》、《紀周雲祥之亂》、《雲南溫泉志》。卷二十八《滇繹》上。卷三十《滇繹》下。卷三十一《明通鑒》。卷三十二《清史稿·本紀》、《清史稿·地理志》、《清史稿·雲南土司傳》、《清續通考·輿地考雲南省》。所收資料尤以近代地方史料最具學術價值。是志成書後，於民國十八年（1929）以宋體字書寫待刊，因故未能付梓。雲南省圖書館除藏有此待刊清本外，還有秦氏校稿本。（李孝友）

〔乾隆〕滇黔志略三十卷（清）謝聖編輯。聖綸，號研溪，福建建寧人。是書前十六卷為《滇志》，後十四卷為《黔志》，各自為篇。書前有李俊《序》，又在總目後有自識，略謂：“待罪於黔之柱邑凡五載，待罪於滇之雲邑及通判維西凡九載，所至之處，得於簿書餘閑，從容搜擇，悉其見聞合纂編，採於志者十之三，採史、子、集者十之七，始於乾隆戊辰（1748）迄於辛巳（1761），請養旋里，詳加校正，先後垂十餘載，考訂纂輯，間參管見。又所至時有鄙俚之作，不忍盡削，並附贅一二”。《滇志略》的主要內容：卷一沿革（附建置），卷二山，卷三水，卷四氣候，卷五名宦（附使命、武功），卷六學校（附選舉），卷七風俗，卷八人物，卷九列女，卷十物產，卷十一古迹，卷十二流寓，卷十三軼事，卷十四土司（附外徼），卷十五種人，卷十六雜記。各卷目詳於卷首，編中每條下皆注所自出，間附按語，多作議論，也有記聞見的。沿革一卷盡錄雲南舊志，其餘採郡邑志。自稱“採於志者十之三”，實際上不啻十之五六。此書《〔道光〕雲南通志·藝文志》著錄，摘錄自序及目錄，知在雲南有傳本，後不見稱說。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乾隆間刊本，雲南省圖書館自科學院圖書館抄得副本。《〔道光〕雲南通志》說：“風俗卷中，每就一二傳聞之事以概其餘，殊多失實，疏略亦屢見也”。這是因所記多揭露當時社會矛盾，為當權者及士大夫所不樂聞，實際上這些記錄對於考究史事和當時社會情況頗有參考價值。（李孝友）

〔嘉慶〕滇繫（清）師範編撰。範，字端人，號荔扉，趙州人，任安徽望江知縣時編刻引書。卷首有嘉慶丁卯（1807）自序及例言，略謂：“通志之缺已逾七十年，文獻無徵，範滋懼焉；七十年以上必核其真，七十年以下謹撮其略”。“筆始於丙寅季夏（1806），告成於丁卯季冬（1807），共閱書四百餘種，其專為滇作者，除舊志、新志、志草及各府州縣井諸志外，尚二十餘部”。可見範作此書用力甚勤。費淳為之《序》謂：“是書綱舉目張，簡而得要，特論確而取義精”。姚鼐《序》說“撰論古今是非，綜核形勢之利病，兼採文物，博考故實，此史氏一家之美”。此書為人看重，對學習雲南史地之人，有重大的參考價值。全書分為十二系：疆域（沿革、形勢、關驛、城池附），職官（兵防循卓附），事略（師旅、封拜附），賦產（倉儲、錢法附），山川（水利、古迹附），人物（選舉附），另有典故、藝文、土司、屬夷、旅途、雜載，全書四十冊，而典故八冊，藝文十八冊已占全書之半。此書取材，大都出自志乘，而補益志乘所未備。師範所見的志書，為《〔康熙〕雲南通志》及《〔雍正〕雲南通志》，取以相互比較，可以看出其損益。除此兩部通志以外，土司、屬夷、旅途即出自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而顧炎武的書又錄自《〔天啓〕滇志》。《典故》第五冊有包見捷《賦役志》、莊祖誥《兵食志》，也是出自顧炎武的書，但不注出處，令人難以索解。《小方壺齋輿地叢抄》中轉錄此書之文，凡不注出處的地方，就署名師範，而不考其所本。故閱讀援引此書，不可不留意這一點。另外，此書所載之文，雖有注出處，而文句多更易，書首《例言》說：“間有未協，少為更正，取持鯁生之禿管，擬作往哲之諍臣”。因此，師範書中，時常刪潤原文，所以不能認為此書是稱引原書，這也是不可以不留意的地方。《自序》說：“夫滇胎於皇初，萌拆三代，立於秦，步於漢，蹢躅於魏晉南北朝間；翔於唐而旋於庫，終庫於五季與宋；蘇於元，趨於明，而極舞蹈之節於我國家”。這是頗有見地的論說，足見數千年滇史，透澈於胸懷，因此即使其書雖不免有疏漏，而仍不失為考核滇史之善本。師範編刻此書於望江，於嘉慶十三年（1808）完成，傳本甚稀，光緒十三年（1887）雲南通志局復刻，後收入《雲南叢書》，重印後流傳甚廣。（李孝友）

〔嘉慶〕滇雲紀略二卷（清）張若繡纂。若

繡，字逸公，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隨軍來雲南，“跋涉數萬里，羈縻二十年，遍歷三迤郡邑”，對程途中所見滇雲景況，諸如山峙川流、邊徼屏障、元明古迹、方物名產及花木珍奇，無不“逐境記錄，納諸行笥”。乾隆三十一年（1766）又隨“王師征緬，從戎於木邦、杉籠之間，事竣師旋，道過大理書肆中，收獲無名氏所錄《六詔遺事》一帙，惜殘缺不備，故於公務餘閑，取《雲南通志》及《南詔野史》、《古滇說》、《滇載記》諸編，纂要芟繁，辨訛訂舛，仿《廣輿記》始成《紀略》兩卷”。書成未刊，後得鄂虛谷資助，於嘉慶十三年（1808）付梓行世。是書卷首載方覺、光立聲序及自序，另有凡例五則。卷上內釐：疆域形勢、歷代名稱、周秦至唐宋沿革、南詔蒙鄭趙楊段高六氏割據（附三十六蠻部）、元明沿革、國朝沿革；卷下內釐：山水、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列女、仙釋、物產、夷種（附方言）。後人認為此書“記頗詳備，文筆亦雅潔可觀”。雲南省圖書館傳抄北京圖書館藏嘉慶十三年（1808）原刊本度藏。（李孝友）

〔光緒〕滇南志略六卷 又名滇南識略

（清）劉慰三纂。光緒七年（1881）二月升泰序說：“光緒己卯（1879），余拜藩鎮之命，七月到官，時制府劉公（按：劉長佑）、中丞杜公（按：杜瑞聯）補刊《雲南通志》告成，寓目焉，其書繁重至百八十卷，公暇若不能遍讀。適檢篋中得愛必達公及李公廷輝所為《黔南識略》，喜其簡而舉要，因援劉慰三太守，仿其體為是書，以便觀覽”。據《〔光緒〕雲南通志》卷一二七《官制題名》：升泰，正黃旗蒙古人，光緒五年至七年任雲南布政使，作書就在此時。原稿六卷，原為上海徐家匯藏書樓度藏，已歸上海圖書館，書仿《黔南識略》體例，總叙之後，分府、州、廳，縣從志書簡要錄之，而補道光以後事，有空格待補的地方，如各州縣田畝、稅、糧之數，可能準備據檔冊入錄，尚未完稿。又全書珠筆點句，有校改字句及長段眉批，頗多可取，不識為何人所為。雲南省圖書館藏有傳抄本。（李孝友）

〔光緒〕雲南地志（清）劉盛堂編。是書為清末所編地學教材，作者鑒於“昔日地學考古而不知今，驚遠而嘗忽近”，並認為研究地學“必自現狀始，自本鄉始，由今遡古，自近及遠”，方能“體用兼賅”。於是參考古今輿地之書及有關雲南著述，按

教材體例，編成此書。內分疆域、地勢、山脉、水源、天氣、物產、人民、建置、區劃、土司邊防等項，下係子目四十一，每項作為一課，長者二至三課，附總圖一，分圖二十三。材料多據《雲南通志》簡錄。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由愛國小學堂石印。敘事扼要，附圖亦精。（李孝友）

〔光緒〕滇疆紀略（清）江浚輯。浚，字惟清，杭州人。光緒三十四年（1908），隨軍由湘黔至滇，供差於蒙自、個舊，周履滇東，至南防，留心滇事，摘抄志乘為《滇疆紀略》，所錄有《滇繫·疆域系》，《〔光緒〕雲南通志·總論》。於各府、州、廳、縣，摘錄沿革、疆域、形勢、天文、天度、氣候、風俗、城郭、廢城、故縣、名山、江河、水利、津梁、關哨、汛塘、鄉鎮、驛鋪、古迹、名勝、廟壇、寺觀、衙署、公所、會館、營壘、陵墓、金石、雜說、異產諸目。對清季新政，亦有記錄，主要是為官吏之資鑒而輯。原晉寧方氏學山樓藏有抄本。（李孝友）

〔光緒〕雲南考略（清）龔柴撰。柴，浙江寧波人，所作地理概述之作甚多，見於《小方壺齋輿地叢抄》中，堪稱博識之士。是書紀雲南沿革、名山、大川、古迹、人物、物產，寥寥數條，當錄自志乘而能得其要，間有列論，亦頗平正。如曰“雲南自漢唐以來，冠朔文章，咸遵中土，迨元明地入版圖，聲名文物，駸駸乎比烈中原”。於欲知雲南歷史者，可領略此數語，堪稱言簡意賅。（李孝友）

〔光緒〕全滇紀要（清）佚名纂。光緒三十一年（1905）雲南課吏館排印本，十冊，載雲南歷史沿革及疆域，為通俗讀物，曾一時通行。（李孝友）

〔光緒〕全滇始末一卷（清）佚名纂。雲南省圖書館藏舊抄本，為雜錄雲南史地之書。清季開辦學堂，有鄉土教材，全省讀物之外，各府州亦有編撰者，大抵錄自志乘，舉其概要。（李孝友）

〔光緒〕雲南地略（清）馬冠群撰。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抄》，為清季學堂地理教材，非專門著作，惟可作參考資料。（李孝友）